

# 重读“钓鱼城”

## 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

“这座城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，延长宋祚 20 余年。正如明代人邹智所说‘向使无钓鱼城，则无蜀久矣；无蜀，则无江南久矣。宋之宗社，岂待崖山而后亡哉’。”

而且，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内乱，直接导致了元朝的建立，蒙古大规模扩张的势头也基本结束，在某种意义上，间接影响了中古时期的世界格局

本报记者李勇、张桂林、刘恩黎

公元 1260 年，席卷西亚，先后攻灭阿拔斯王朝、占據叙利亚，兵锋直指埃及的蒙古大军，突然勒马不前，主力军团挥戈东返。

前一年，在相隔万里的东亚大陆，南渡长江围攻南宋鄂州（今湖北武昌）、震动江南的忽必烈大军，于破城在即时，遽然退兵北还。

气势如虹，横扫亚洲的蒙古铁骑，几乎在同一时期如潮水般退却。

而这一切都因为自中国西南嘉陵江畔传出的消息：率军进攻四川，意图顺江东下灭亡南宋的蒙古大汗蒙哥，在合州钓鱼城遭到顽强抵抗，于 1259 年农历七月身亡。

蒙哥死后，汗位空虚，蒙古诸王纷争遂起，各军团匆忙从亚、欧战场回撤。命悬一线的南宋王朝，暂时得免灭国之祸，亚欧大陆的格局也因此改变。

700 多年后，在重庆合川嘉陵江畔的钓鱼山上，一条攻城地道、几段御敌城墙、数十枚铁火雷残片，尤其是一座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的发现，使这里跻身“2018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在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下，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这座曾改写亚欧历史的传奇城堡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

### 西南一柱：防御体系关键支撑

自长江、嘉陵江交汇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西折、北进，溯嘉陵江上行 90 多公里，就来到了古称合州的滨江之城重庆合川。在合川城东部，一座最高海拔近 400 米的钓鱼山，伫立在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交汇的半岛之上。

依山就势的钓鱼城巍然屹立于山巅，北、西、南三面峭壁悬崖据江而立，险绝异常。这里曾见证波及亚欧大陆的金戈铁马、滚滚烽烟。

1235 年，蒙古大军在西征东欧、东征高丽的同时，大举出兵南下攻宋。自此，双方在西起川陕、中抵荆襄、东至江淮的三大战场，展开数十年攻防。因地处长江上游，东扼夔门天险，顺江可趋吴楚，巴蜀地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蒙古攻宋的首要目标。

为稳固“西门”“后户”，1242 年，南宋朝廷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升任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抚制置使，主持全川防务。鉴于成都已失陷，川中残破，余玠兼知重庆府。重庆由此成为全川抗蒙的军政大本营。

遇阻蒙古军继续南下掘长江破夔门，成为余玠到任后的头等大事。他“集众思，广忠益”，充分运用巴蜀山险对抗蒙古的骑兵优势。1243 年，命人筑城于嘉陵江下游三江交汇、重庆正北的合州钓鱼山上，并迁合州治所、兴元（今陕西汉中）戎司于此，驻以重兵。

同时，相继在川东各山隘建山城数十座，最终形成以嘉陵江、长江为依托，以重庆为核心，以点控面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。地处“蜀口形胜之地”，屏障夔门的钓鱼城，则成为这一体系的关键支撑。余玠帅蜀期间，多次以钓鱼城为前线指挥中心，联动各山城，率领宋军与蒙古军在四川开展攻防，“多有劳效”。

此后数十年间，来自秦、陇、蜀地的数万南宋军民冒险坚守钓鱼城，“春则出屯田野，以耕以耘；秋则收粮运粮，以战以守”，使这里成为拱卫南宋“西门”的坚强堡垒，并在蒙古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灭宋的紧要关头，奋起抗击，扭转乾坤。

700 多年后，当人们走近钓鱼城时，眼目所及，山险依旧，但城下缠綿环抱、波澜不惊的江水，城里茂林修竹、清幽宜人的山色，让人很难将这里与蒙古古战场相连。几经复建的城门、城墙、马道、校场，也难辨年代和真伪。

历史的烽烟，似乎已不可触摸。人们难以想象，眼前这个弹丸之地，在 13 世纪，何以能阻遏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 36 年，及至南宋灭亡，仍然屹立不倒？

即便在专家学者看来，钓鱼城战役和山城防御体系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少，但多囿于史料，缺乏考古实证支持，还有诸多困惑与疑团待解。

“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却活在许多无从考证的典故和传说中，真正的历史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。”痴迷于蒙宋之战的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暗下决心：不能让人们之于钓鱼城的疑惑继续无限。

2004 年，钓鱼城考古发掘全面启动。此后 15 年里，袁东山和同事们踏遍钓鱼山方圆 20 余平方公里，试图找出掩盖在历史迷雾里的“英雄钓鱼城”。

史料显示，元军最终占领钓鱼城后，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拆毁。清代，当地为抗击白莲教，局部利用蒙宋战争期间的钓鱼城址进行了复建。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，一批专家结合文献研究复原了钓鱼城，但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区分钓鱼城的宋代城垣和清代城垣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当地为发展旅游又新建了部分城墙和设施。这些都给前期考古工作带来一定影响。

“我们首先就要辨识宋代史料开采加工、城墙砌筑方式等留下的痕迹，在此基础上，探寻蒙宋时期的钓鱼城。”袁东山说，加上钓鱼山范围很广、险峻崎岖、植被茂密，踏勘和测绘难度很大，“大概花了五年时间，才完成钓鱼城城墙的平面分布图。”

通过时代甄别和空间重构，考古工作者们发现，南宋钓鱼城比保留至今的清代城体系宏大很多。

“不仅守山而且控江。”袁东山说，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误解——认为古钓鱼城就是现在看到的钓鱼山顶 2.5 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。“事实上，蒙宋战争时期的钓鱼城，是一个山、水、地、城、军、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。”

“钓鱼城之妙首先体现在地利上。”袁东山说，它既利用了山江之险，又有沟通之便。城池选址于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汇流处，南、北、西三面环水，是控扼长江上游的咽喉要道；其山峰突兀耸立，相对高度约 200 余米，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东

面则有堑沟阻隔。钓鱼城四周山麓田地广阔，还有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，使之具备了蓄积人力物力、长期坚守的基础。

最为关键的是将人力与天险融合，防御体系精心巧妙。考古队发现，南宋筑城者们沿钓鱼山南北山麓，修筑了两道奇特的“一字城墙”，分别延伸至山脚江边的水军码头，如同从山顶伸出的两只手臂，拽住长达 20 公里的嘉陵江，形成了“控山锁江”的坚实屏障。

“一字城墙完全隔断了钓鱼山东西交通，有效阻碍了城外敌军运动；通过拱卫水军码头，又将宋军的水军优势最大化，压制擅长陆路作战的蒙古骑兵，同时也保障了钓鱼城的水上后勤补给线。”袁东山表示。

在考古人员一锹一铲发掘下，南宋钓鱼城防御体系的“拼图”逐渐清晰：以钓鱼城山顶环城和南北一字城为核心，利用三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势控扼三江，北西南三面环绕的江水形成天然护城河，东面则利用山冈、堑沟、城墙阻隔。南北水军码头筑起水上防线和补给线。

于是，钓鱼城延伸成为 10 余平方公里的半岛防御整体，从而有效担负起屏障重庆、控御东川作用。恰如南宋蜀人阳枋赋诗所言：“吴门捍蔽重夔渝，两地藩篱属钓鱼。自昔无城当蜀屏，从今有柱壮坤舆。”

### 大汗殒命：铁火雷所伤致死？

1251 年，成吉思汗之孙蒙哥继承汗位。雄心勃勃的蒙哥大汗，决心建树功业。在相继派出诸王西征西亚、东征高丽、远征大理国后，又谋划以左、右两路大军，会同已占据云南的军队，大举攻宋。

蒙哥决定亲率右路军经关中进攻四川，企图攻取重庆，东下夔门，与左路军和南翼军会师于鄂州，再顺流南下，直捣临安，灭亡南宋。

1258 年农历七月，蒙哥统精兵四万，号称十万大军，自六盘山挥师南下。此时主持四川防务的一代名将余玠，因受疑于南宋朝廷已自杀身亡多年。由于宋廷政治腐败，继任帅蜀者，皆无大的作为，四川山城防御力量大为削弱。

蒙哥一路过汉中、入利州，取苦竹隘，拔长宁山城，降大获、青居、大良诸城。1258 年底，沿途汇集而至的约 7 万蒙古军，沿嘉陵江南下抵合州，兵锋直指重庆。

在攻破合州旧城，切断钓鱼城与周边山城联系后，1259 年农历二月，蒙哥以“困守环攻”战术，督率水、陆诸军持续围攻钓鱼城。但在南宋守将王坚的带领下，钓鱼城守军冒险抗击。蒙古军围城数月仍不能克。

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农历二月三日，蒙哥督诸军战钓鱼城下。七日，蒙古军从东面猛攻一字城。九日，猛攻镇西门，均不克。农历三月，从东、北、西三面攻东新门、奇胜门和镇西门外的“小堡”发起强攻，再次失败。农历四月，接连 20 天大雨，暂停攻城。二十二日，强攻护国门，败归。二十四日夜，绕道西北进攻外城，一度登上城头，但最终被打退。入夏后，暑热至，蒙古军“军中大疫”“士马不耐其水土”。农历六月，征蜀前锋将汪德臣在战斗中受伤害身死，蒙古军锐气大挫。农历七月，转战东西、纵横南北的一代骄子蒙哥大汗，也“崩于钓鱼山”。

丧失主帅的蒙古军迅速北撤。同年农历九月，南宋朝廷宣布“合州解围”，钓鱼城战役结束。

蒙哥大汗的死讯辗转传往长江中游及西亚后，蒙古军的征伐顿时失去了势头。征西亚的旭烈兀、攻鄂州的忽必烈等部军队，陆续回撤。

但钓鱼城之战中，蒙哥大汗到底因何而死？史料记载莫衷一是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蒙哥汗自农历六月起即“不豫”，至七月癸亥“崩于钓鱼山”。拉施都丁《史集》记述，蒙哥因水土不服而得了赤痢，为对付病症，他坚持饮食，使“健康状况恶化，病已到了危急之时”，终于死于“那座不祥的城堡下”。

病死说之外，也有受伤致死的说法。明万历《合州志》所引无名氏《钓鱼城记》称，蒙古军在“西门外筑台建桥楼，楼上设炮，欲观城中之水有无”。城内宋军“俟缘桅者至其竿末，方欲举首，发炮击之，果将桅人远抛，身殒百步之外”。亲临现场督战的蒙哥，“为炮风所震，因成疾”。在去重庆缙云山寺途中，“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”。

蒙哥之死，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。十多年来，袁东山和队员们在钓鱼城古战场上，也为解开这个历史谜团，寻找着蛛丝马迹。

2005 年，在钓鱼城西北的古地道中，考古队员发掘出 80 余片弧形铁器残片，经确定是铁火雷爆炸后的碎片；2013 年，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出土一枚铁火雷爆炸后的弹片，2017 年又在该遗址出土铁火雷残片一枚。

结合技术测定和史料分析，考古人员认为，钓鱼城战役中，蒙古军开凿地道想以“地突”战术攻城，而宋军则以铁火雷御敌。由发现小弹片的数量推测，当时投入战斗的铁火雷，可能数以百计。

记者日前在考古现场看到，2017 年出土的这枚铁火雷残体呈圆球形，直径 11 厘米，壁厚约 1 厘米，差不多有一个脐橙那么大，采用硬度非常高的白口铸铁作外壳，内腔用于填充火药。“这些铁雷外观设计精巧，内置药线引爆，有着相当威力，在当时的战场上可谓安全、精准、高效的先进武器。”袁东山说。

袁东山介绍，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，到宋代已演进为初级火器。北宋出现火药箭和火球，南宋创制出铁壳火球——铁火炮和各种火枪。刀光剑影的冷兵器战场上，开始弥漫炮火与硝烟。

据文献记载，南宋理宗宝祐五年（1257 年），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曾伯提及，荆州每月生产“铁火炮”在 1000—2000 件，库存多达十几万件；开庆元年（景定二年，建康府知府马光祖提到，建康府在两年时间内，生产火攻器具 6 万余件，其中各种规格铁炮壳 3.5 万余件，平均每月也有 1000 多件，“由此推断，宋蒙战争期间的山城，铁火雷产量也应是相当大的。”

“此前发现的宋代火器实物少之又少，钓鱼城的这些发现，为宋代火器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。”袁东山说，更重要的是，铁火雷的发现，也为蒙哥死因的学界争议，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。

据明万历《合州志》记载，“宪宗为炮风所震，因成疾……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。”既往认为，“炮风”为发射的礮石所



▲钓鱼城南水军码头航拍。袁东山供图



▲钓鱼城发掘出的铁火雷。本报记者刘恩黎摄



▲钓鱼城防御体系示意图。袁东山供图

致。元代人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，记载 1280 年扬州炮库爆炸事件时，也提到“炮风”“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，楹栋悉碎裂，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……”袁东山认为，从文中推断，“炮风”应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，“结合钓鱼城发现的球形铁火雷，蒙哥大汗有可能是被铁火雷类火器炸伤后死亡。”

“护国城头飞炮烈，温泉寺内大王横……”火器在钓鱼城之战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，在袁东山看来并非偶然。他表示，通过多年考古发掘，重庆地区的南宋球形铁火雷遗存不断被发现，说明这种火器并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有着成熟的制造技术，且在战争中得到普遍应用。这种先进的武器对当时局部战役有着重要影响，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走向。

### 百战弥坚：长达 36 年坚守的秘密

巍巍钓鱼山，碧血映烟云。当年那场使蒙古大汗殒命，牵动亚、欧格局的战役中，乃至在长达 36 年的坚守中，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枢纽和指挥中心在哪里？他们又是如何指挥若定，以弱胜强，创造奇迹的呢？

史载，蒙哥大汗攻蜀时，合川钓鱼城守将为南宋兴元都统制兼合州知州王坚。王坚自 1254 年莅任后，对钓鱼城进一步加固，筑南北一字城，兴修水师码头，在城内建池凿井，同时利用钓鱼山良田千亩“保民练武”，且耕且战，聚集秦、陇、蜀地退守而来的军民十数万人，“人物愈繁，兵精粮足”。

“钓鱼城之战堪称世界战争史上要塞防御、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。但遗憾的是，一直没找到作为防御指挥中心的州治、戎司衙署。”袁东山说。

2012 年，考古人员在钓鱼城南一字城发掘中，发现城墙随山势升高到半山后，变成垂直高起二三十米的断崖，而断崖之上又发现东西两道城墙，与断崖面一起，形成南一字城的内城。按照常规，内城东边的城墙迎敌面朝东，西边的城墙迎敌面朝西，但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，西边城墙迎敌面仍然朝东。这似乎在提醒，南一字城内城以西的区域，才是防守的重心所在。

结合此前在钓鱼城西北发现的蒙古军为突袭攻城挖掘的地道，袁东山意识到，钓鱼城西部山腰处的范家堰，可能是一个“被严重低估的区域”。

2012 年 8 月，袁东山顺着尚未发掘完毕的一字城城墙朝西走，在人迹罕至的范家堰，他举目四望，这里位于钓鱼山二级台地上，背倚山顶，面朝嘉陵江，整体隐藏在主峰之下的山坳中，台地之外即是落差近 30 米的陡峭悬崖。可以想见，当时蒙古军队从山下仰视很难发现这一区域，这里也处在炮火、弓箭的射击死角，易守难攻，正是指挥中枢的理想之地。

“那天击退，易守难攻，正是指挥中枢的理想之地。”袁东山说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范家堰在当时的特殊地位。建筑残垣逐渐露出，我兴奋得中午饭都没吃下。”袁东山说。

随着范家堰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，是一组气势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筑遗址。

记者在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发掘现场看到，这一遗址主要由东部的前、中、后三进院落，及西部水池亭榭等两部分景观建筑构成。院落依山呈阶梯式构筑，整体高达 16 米，设计巧妙。巨石垒砌的围墙、精美的水池、细致的浮雕、厚重的礮石随处可见。

考古现场负责人王胜利介绍，已经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厢房、仪门、道路、排水沟等遗迹 144 处，出土宋代瓷器、铁器、炮弹残片等标本 1100 余件。园林景观部分还发现了水池、石灯，艺术价值相当高，其中一座在当时只能建于皇宫和孔庙中的乌头门遗址，更凸显出范家堰在当时的特殊地位。

“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建筑遗迹信息，可以认定，范家堰遗址就是蒙宋战争时期南宋合州衙署。兴元戎司所在地，也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。”袁东山说，范家堰衙署遗址也是目前川内唯一经大规模科学发掘、保存较为完整的南宋衙署遗址，价值重大。

“大军压境之际，钓鱼城军民还能修筑如此宏大精美的衙署，不仅体现了宋代能工巧匠们的建筑造诣，也彰显出当时人们沉着应战强敌的自信和决心。”袁东山感叹道。

据史料记载，钓鱼城之战，在长达 5 个月的攻城战中，蒙古军虽然“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”，却“炮矢不可及也，梯冲不可接也”，只能派出小股人马履崎岖以登，冒险强攻，如果不是因为士卒伤亡惨重而“苦战不前”，就是由于后军不继而败退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尽管蒙古军有几次攻破外城，甚至一度登上城头，“伤宋兵甚重”，但始终无法突入钓鱼城核心区域。

反观钓鱼城守军，则是士气高涨、斗志正旺。万历《合州志》引《钓鱼城记》记载，宋军一度发炮，向城外抛掷重 30 斤的鲜鱼二尾、蒸面饼数百，并谕以书曰：“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，再守十年，亦不可得也。”守将王坚更是白天率军抵抗，夜晚不时派兵袭扰敌营，使得蒙古军夜不安枕。

“如果说钓鱼城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皇冠，那么范家堰衙署遗址就是皇冠上的明珠。”袁东山说，正是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、精良的防御布局，钓鱼城守军才能在对抗蒙古大军的战斗中创造出奇迹。

### 落幕与回响：探寻仍然没有止步

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，改变先取巴蜀的灭宋战略，逐渐把进攻重点转移到长江中游的荆襄战区。蒙宋双方在四川战场进入相峙状态。

作为重庆前哨的钓鱼城，与嘉陵江、长江沿岸诸多山城相互支持、依存，足以控扼东川，因而仍是蒙宋争夺的焦点。1268 年起，忽必烈先后调集近十万大军围襄阳，开始了长达 5 年的襄樊之役，也揭开了蒙古第三次征宋的序幕。

为牵制南宋从巴蜀调兵援助襄阳，蒙古军在四川开展大规模袭扰，尤其加强对钓鱼城的包围，并在钓鱼城与其他山城之间“筑城进窥”。但钓鱼城守将张珪战守有力，“往往出奇制胜，斩获累捷。”直至襄樊战役结束前，蒙古军在钓鱼城只能“春去秋来，出没无常”。

奈何历史的车轮终究无法阻挡。1273 年，元军进占襄阳后，忽必烈下诏水路并进，大举灭宋。四川诸多城镇也相继被元军取得。1276 年初，南宋朝廷在临安降元。元军也加快了平定四川的步伐，一年多时间里，先后陷泸州、平东川。1278 年农历二月攻破重庆城，绍庆、南平、夔、施、思、播等州皆下。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。1279 年正月，钓鱼城守将合州安抚使王立，以不可屠城为条件终止抵抗，开城降元。南宋坚守了 36 年的钓鱼城，至此最后陷落了。同年，逃至崖山的幼帝赵昺，蹈海而死，南宋灭亡。

渝水悠悠，孤城无言。烽烟散尽的钓鱼城，如今像一位英雄迟暮的巨人，静卧在波澜不惊的嘉陵江畔，任那惊天动地的热血与炮火，掩埋于厚厚的尘土和时间的长河。

范家堰遗址的发现，无异于一次穿越时空的唤醒。让这座创造历史的英雄城再次鲜活起来。随着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，钓鱼城的军事、文化、历史乃至世界性价值和意义，逐渐开始显现。

“考古发现和文献互相印证，让这座宋蒙（元）时期的重要遗址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。”袁东山认为，作为蒙宋战争的重要节点，钓鱼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功遏制往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进攻，彰显出南宋军民坚忍顽强、忠贞不渝的精神气节。钓鱼城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，也是一座精神宝库。

这座城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，延长宋祚 20 余年。正如明代人邹智所说“向使无钓鱼城，则无蜀久矣；无蜀，则无江南久矣。宋之宗社，岂待崖山而后亡哉”。

而且，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内乱，直接导致了元朝的建立，蒙古大规模扩张的势头也基本结束，在某种意义上，间接影响了中古时期的世界格局。

钓鱼城的军事价值也不言而喻。“钓鱼城防御体系是中国积极防御思想的集大成者。”在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奚江琳认为，作为世界重要的军事遗产，钓鱼城集中体现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，展现了东方战争智慧和积极防御的奋斗精神。

“钓鱼城还让人们见到了我国‘火器鼻祖’的真实面貌。‘中国最早期的铁壳爆炸弹铁火雷’，是古代中国在火药火器领域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。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异表示，钓鱼城出土的南宋铁火雷残片，不仅为火药火器发明史研究提供了长期缺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，而且为深入探讨 13 世纪的战争史、军事史提供了新的物证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如今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钓鱼城古战场，正在经历“重生”。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钓鱼城已经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。2019 年 3 月，重庆市向国家文物局提出钓鱼城遗址申遗正式申请。今年下半年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将启动建设。

但关于钓鱼城的进一步探寻仍然没有止步。“考古揭露硬遗址，解读软文化。”袁东山告诉记者，在继续做好范家堰遗址研究的同时，还考虑对一些文献记载不多的关键点位、矛盾点位进行勘探发掘。

对钓鱼城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、展示和传承，也越来越让袁东山“操心”，“让大众可以轻松读懂钓鱼城遗址的空间特征，理解蒙宋战争的历史现象，感悟宋人的精致生活，传承钓鱼城守将的忠勇精神，是下一步想着力做的。”

“钓鱼城发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历史、和间接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。关于钓鱼城价值的研究，还应该深入和强化。”在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，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的发言，引起广泛共鸣，“应站在更高层次、从全世界层面来审视这场战争和这座山城。”

（稿件中有史实参考陈世松等著《宋元战争史》）

